

【史学博士论坛】

前燕正统观的发展变化

——兼及中原士人出仕前燕心态

赵红梅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3—5世纪,慕容鲜卑人的正统观念在“华夷观”、“正闰观”、“道统观”的阶段变化中,体现出前燕政权“勤王杖义”、“自称燕王”、“已为天子”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原士人出仕前燕的心态也经历了由慕容廆时期受“华夷之辨”影响流寓前燕多为避乱保宗族,到慕容皝时期欣然接受慕容氏政权,甘心情愿建立功勋,再到慕容儁时期认同前燕承续正统的转变。其最为直观的表现即为前燕的德运之争,由四库馆臣在《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金德运图说》的图表中前燕奉行“木德”,入燕出仕的中原士人在前燕德运之争中为慕容儁出谋献策,使前燕由慕容儁朝时期所奉行的“水德”最终实现了在慕容暉朝改奉“木德”的转变。

【关键词】前燕; 正统观; 中原士人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1)06-0074-04

3—5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文化碰撞的重要时期。关于前燕历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中外学者多有关注,并在论著中有所涉及,且大多将前燕纳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与统一、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汇聚与升华的角度给予宏观考察。将前燕历史回归到3—5世纪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在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暉相继统治时期,慕容鲜卑人在正统观念的阶段变化体现出前燕政权从“勤王杖义”(311年)至“已为天子”(352年)的历史性转变。

一、“勤王杖义”时期前燕的“华夷观”

太康五年(284年),慕容廆主政之后为取得出兵宇文鲜卑的合法权,曾向晋武帝上表乞师,遭到晋武帝的拒绝,前燕开始寇略辽西、进军夫余的武力扩张。在屡受西晋所阻后,慕容廆君臣确立了“勤王杖义”(311年)的策略,走上了朝贡西晋王朝的道路,为前燕政权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

(一) 尊晋勤王朝贡两晋

形成于先秦的华夷观念不仅广为中原士人所熟知,在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慕容廆已经意识到“华裔理殊”的民族差别。在这种背景下,适时采取了尊晋勤王策略,打着“勤王杖义”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笼络中原士人,弥合“华夷之辨”在前燕君

臣中的心理隔阂。

永嘉(307—313年)初期,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永嘉三年(309年),鲜卑首领素连、木津打着诛杀辽东太守庞本,为东夷校尉李臻报仇的旗号,攻城略地、杀掠士庶。晋怀帝以封释为东夷校尉,封释到任后,斩杀庞本。直到永嘉五年(311年),素连与木津叛乱仍未平定。慕容翰认为,前燕尊晋勤王的时机已经成熟,前燕出兵平定叛乱:“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1] P. 2805}这一建议被慕容廆采纳。经此一战,不仅使慕容部的实力得以增强,也使前燕在东北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得到加强。

建武元年(317年)六月丙寅,鲜卑大都督慕容廆与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劭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疑、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等180人上书劝进司马睿即皇帝位,认为东晋为西晋的继承政权,东晋王朝承袭了西晋王朝的正统地位。

(二) 皇帝玉玺“献捷江东”

从传国玺的情况来看,前燕,也还是奉东晋为正统。慕容廆在从宇文部悉独官那里“获皇帝玉玺三纽”后,并没有借此机会称王称帝,而是听取宋该的建议,将三枚玉玺“献捷江东”。既然能够将所得玉玺献于东晋王

【收稿日期】2011-08-20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研究”(10@ZH006)。

朝，说明慕容廆时期前燕承认当时的东晋为正统王朝。

太兴二年（319年）裴疑从前燕都城棘城（今辽宁朝阳市）出发，太兴三年（320年）三月底到达东晋都城建邺。作为前燕政权的“遣晋使”，裴疑此番出使东晋的目的有二：一是将慕容廆从宇文悉独官军营中获得的三枚皇帝玉玺奉送给晋元帝，以示奉东晋为正统；二是加深东晋君臣对前燕棘城政权的了解与认知。在裴疑未到达建邺之前，东晋君臣一直把慕容廆看做东晋边疆一位豪强，裴疑见到东晋君臣后，“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举朝改观焉”。此后，东晋改变了对前燕政权的看法。裴疑即将返回棘城之前，得到东晋元帝的挽留，裴疑婉言谢绝“臣世荷朝恩，濯纓华省，因事远寄，投迹荒遐。今遭开泰，得睹朝廷，复赐恩诏，即留京辇，于臣之私，诚为厚幸。顾以皇居播迁，山陵幽辱，慕容龙骧将军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故遣使臣，万里表诚。今若留臣，必谓国家遗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怀义懈怠。是以微臣区区忘身为国，贪还反命耳。”^[1]（p.2812）裴疑对前燕棘城政权的忠诚，不但打动了东晋君臣，也感动了慕容廆，慕容廆得知这一情况后对群臣赞叹“裴长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岂非天以授孤也。”裴疑以其出众的才华和对前燕政权的忠诚，得到了慕容廆的充分信任与重用，裴疑在成功出使东晋王朝之后不久，就结束了他的长史生涯，先是出任辽东相，之后又接任乐浪太守等职。

（三）“华夷之辨”与“请封燕王”

慕容廆破崔崑后，获将军高瞻。慕容廆署高瞻为将军，高瞻虽已归降前燕，但称疾不起。慕容廆敬其姿器，多次亲临问候。在一次探望中，慕容廆认为，高瞻是因为“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才长期称病不起。以高瞻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原士人虽然归顺前燕，但因前燕慕容氏政权为胡族政权而不愿侍奉，才会采取消极的方式抵抗。尽管鲜卑慕容氏政权的汉化水平相对较高，仍无法改变其“非华”的现实，以至于高瞻至死都未为慕容廆竭心效力。从高瞻“以忧卒”来看，这时的前燕虽以重儒称雄东北，但在一些中原入燕士人眼中，前燕仍为“夷”，而有别于“华”。

《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中记载，太兴四年（320年）冬十二月，东晋元帝“遣谒者即授印绶、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至此，慕容廆取得了合法统治“海东”的权力。在慕容廆时期，前燕君臣虽然都认同“天授有晋”，但是，前燕群臣在“请封燕王”的问题上也发生争执，症结在于对“华夷之辨”的认识。其中，主要以韩恒与宋该等人的言论为代表。咸和中，宋该等建议“以廆立功一隅，勤诚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镇华夷，宜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2]（p.2842）慕容廆命臣下群僚博议，均认为应该采纳宋该的建议。只有韩恒驳斥道“自群胡乘间，人婴荼毒，诸夏萧条，无复纲纪。明公忠武笃诚，忧勤社稷，抗节孤危之中，建功万里之外，终古勤王之义，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

故桓文有宁复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候机会，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后，九锡自至。且要君以求宠爵者，非为臣之义也。”^[2]（p.2843）慕容廆对韩恒的一番言辞不满，出韩恒为新昌令。韩恒视前燕为夷狄的观念代表了部分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的想法。尽管慕容廆对慕容鲜卑政权有清晰的定位，但他并非心甘情愿接受“华夷之辨”。因此，采取“勤王杖义”策略，以及尊两晋为正统只能说是慕容廆时期的权宜之计，是前燕势力不足以抗衡两晋时，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从慕容廆谪韩恒为新昌令可以看出，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对前燕政权及慕容廆的定位是不一致的。

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辨”至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以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这些士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流寓前燕士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

二、“自称燕王”时期前燕的“正闰观”

到慕容皝时期，前燕的正闰观经历了从“奉晋正朔、朝贡东晋”、“自称燕王、奉晋正朔”至“皝称燕王、去晋年号”三个阶段的变化。

（一）奉晋正朔，朝贡东晋

“奉晋正朔、朝贡东晋”时期是指慕容皝即位的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至咸康三年（337年）冬十一月，慕容皝自称燕王之前，即333—337年。4年间，慕容皝与东晋之间维系着较为密切的朝贡册封关系。这一时期，慕容皝先后三次遣使朝贡东晋。第一次遣使东晋发生在慕容廆去世之后，慕容皝即位之初遣使告丧于东晋。统治慕容部长达49年的慕容廆于咸和八年（333年）在65岁时去世，慕容廆临终前指定嫡长子慕容皝继承大位。慕容皝即位后，即于咸和八年（333年）六月，“遣长史渤海王济等告丧于晋”^[3]。这是慕容皝时期首次遣使朝贡东晋。

咸康二年（336年）正月，慕容皝从海路征讨慕容仁，得胜后慕容皝遣使上表于东晋^[3]，向晋成帝告知平定慕容仁叛乱一事。咸康二年（336年）九月，慕容皝派遣兼长史刘斌、兼郎中令辽东杨景，护送东晋使臣王齐、徐孟等返回建康。他遗书于侍中顾和“今致绣靴一緡”，并致书于大司马桓温。从咸和八年至咸康二年（333—336年），前燕慕容皝先后三次遣使东晋，从这三次遣使东晋均集中于东晋成帝时期来看，尽管每一次入晋的目的有所差异，但是慕容皝向东晋王朝派遣使者是有共同之处的，即都在于向东晋王朝谋求政治利益。

由慕容廆传位于慕容皝的权力交接进行得并不顺利。慕容皝的庶长兄慕容翰担心受到迫害而出逃，慕容皝的同母弟慕容仁干脆起兵割据辽东半岛，与统治辽西的慕容皝分庭抗礼，慕容部分裂。至咸康元年（335年）冬，

乘气候严寒、渤海结冰之机，慕容皝率军踏冰过海袭击辽东半岛，一举击败慕容仁，重新统一了慕容部。

探究此次慕容鲜卑权力之争的根源，应归咎于慕容皝即位之初“用法严峻”，引起前燕政权内部动乱，慕容皝同母兄弟慕容仁占据平郭、割据辽东。咸和九年（334年）八月，慕容皝派往东晋的使节王济返回辽东，晋成帝派遣御史王齐祭奠慕容廆，并“遣谒者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庾故事。”^[3]结果均被割据辽东的慕容仁扣留，直至咸康元年（335年）冬十月，“慕容仁遣王齐等南还，齐等自海道趣棘城，遇风不至”^[3]，同年十二月，“齐等至棘城，皝始拜朝命”。从此，慕容皝开始正式接受东晋的册封。

由上可见，自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起，慕容皝开始了对东晋的朝贡活动，随着与东晋关系的不断加强，也促使慕容皝加紧了前燕的政权建设，从而使慕容鲜卑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开始走向强盛。

（二）自称燕王，奉晋正朔

“自称燕王、奉晋正朔”时期，即咸康三年（337年）冬十一月，慕容皝自立为燕王至永和元年慕容皝去晋年号之前，即337—345年。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前燕也加紧了对外扩张。慕容皝首先打击的是慕容部的老对手，同处于辽西、同为鲜卑部落的宇文部和段部。咸康二年（336年），慕容皝亲自率领5万精兵，在柳城附近打败段部与宇文部联军。此后，段部首领不得不南下投降后赵，段部在东北的势力完全瓦解。

咸康三年（337年），“冬十一月丁卯，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咸康八年（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这一时期，慕容皝大量任用汉族士人，积极纳谏，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从而使慕容鲜卑从游牧社会迅速步入农耕社会，并对所控制的地区建立健全行政组织。此外，慕容皝还罢苑囿，给贫困的中原流民以耕牛，减轻地租负担，兴建水利灌溉工程，大力发展教育，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这些措施的实施，为前燕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4]（pp. 112-113）。前燕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其在东晋眼中的政治地位大为提升。

咸康六年（340年）秋八月，慕容皝认为自己虽然已称“燕王”，但始终没有得到东晋的册封，便派遣长史刘翔、参军鞠运献捷于京师。慕容皝闻听东晋权臣庾亮死去由其弟庾冰、庾翼继为将相之事后，遂上表于晋成帝。慕容皝引经据典，对历史上后党专权的实例予以解析，指出晋元帝时期庾亮擅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表达了对其弟庾冰专权之忧，意欲说服成帝晋封其为“燕王”。与此同时，又致函于庾冰。慕容皝在致庾冰的书信中肯定了庾氏兄弟在东晋的显赫地位，并借历代王朝中后族专权的负面效应，以规劝庾冰谨守臣礼，强调了分封藩国对维护东晋统治的益处。

前燕长史刘翔等携慕容皝书到达建康已是咸康七年（341年）二月乙卯。此次刘翔等出使东晋，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了晋封慕容皝为燕王的使命，晋成帝终于承认了慕容皝称“燕王”的合法性。

（三）“皝称燕王”，去晋年号

（晋穆帝永和元年）二月，“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号所居新宫曰和龙宫，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慕容皝就是在“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之后，终于自称燕王。是年（345年）冬十月，“皝以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于是，始不用晋年号，自称。”^[5]从此不再奉晋正朔。但是，仍然与中原王朝之间维系朝贡册封关系，用以提高前燕的政治地位。永和三年（慕容皝十四年，347年）五月戊申，东晋穆帝册封慕容皝为“安北大将军，余悉如故”，而不见有慕容皝遣使入晋的相关记事。

在慕容皝在位15年中，前燕东征西讨，开疆拓土，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东北地区的主导地位，成为东北地区实力最强的割据政权。在慕容皝统治期间，东北地区已经不存在可以与慕容部相抗衡的势力了。

三、“已为天子”时期前燕的“道统观”

慕容儁统治时期，前燕政治、经济、军事势力空前强大，这促使前燕在内政外交等重大国策上改变目标。称天子后的慕容儁不再向东晋王朝履行藩属国的职责，也不再接受东晋册封，断绝了与东晋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与此同时，前燕统治者越来越关注中原地区事务。在慕容儁及其继任者慕容暉统治时期，前燕先后出现了二次“德运之争”。这是前燕政权接受中原王朝的政治理念，力图成为正统王朝发展进程中在正统观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慕容儁称帝前的正统观

慕容儁于永和四年（348年）即位。在慕容儁称帝之前，前燕已经对“五德终始说”有所了解。慕容儁三年（351年），前燕内外臣僚并上的《甘棠颂》中涉及酸、苦、甘、辛、咸“五味”，加之春、夏、季、秋、冬“五时”，及青、赤、黄、白、黑“五色”，配以“木”、“火”、“土”、“金”、“水”五行，则“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属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养物，色又赤者，言将有赫赫之庆于中土。吾谓国家之盛，此其征者也。”^[6]也就附会为前燕国运当兴的征兆。

元玺元年（352年）夏四月，以“燕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楛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策，以御四海者也。”^[6]预示着前燕国运当兴，既有符应，又合“三统”，还有“五色”，符“五行”。

“传国玺”亦非一成不变地在中原王朝传承，到了晋怀帝没于胡时，“传国玺”流落刘聪处，后来又没于“石勒”，石季龙死后胡乱，穆帝时乃还江南。也就是说，《晋书》所呈现的正统观中，石赵也曾因得“传国玺”而为正统。石赵得正统之事，是被前燕所熟知的，才会有前燕得承石赵德运之说。慕容儁三年（351年）春二月，“冉闵僭称大号，攻围襄国。赵主石祗危迫，遣故太尉张举乞师许，送传国玺。姚弋仲亦遣使来告，儁

以悦綰为御难将军，帅兵三万往会之。闵闻僞欲救赵，遣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常炜来聘。”^[6]从“冉闵僞称大号，攻围襄国。赵主石祗危迫，遣故太尉张举乞师，许送传国玺。姚弋仲亦遣使来告”来看，此时“传国玺”当在赵。而封裕又说“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救，云玺在襄国”，常炜又提出“寡君今已握乾符，类上帝四海悬诸掌大业集于身”，其意为国玺在冉闵处。

对冉闵僞号的合法性，前燕提出质疑，常炜诘问冉闵僞号的“祥应”。也就是说，在前燕看来，冉闵是在没有祥瑞符应的条件下就僞越称王的，如果既无国玺，又铸形失败，冉闵也就不具备僞号的资格。元玺元年（352年）八月，前燕灭冉闵政权时，冉闵手中应有“六玺”，则六玺并非真正在慕容儁手中，而是被闵将蒋干送于东晋处，此时东晋方得传国玺。“奉玺君”是慕容儁为其称帝合法化而给予闵妻的封号，是与东晋争夺正统地位的表现。在慕容儁称帝过程中，非常重视传国玺的作用与影响。直到慕容评攻克邺城，将冉闵妻子、僚属送于中山后才即帝位。

（二）德运之争：从“水德”到“木德”

东晋永和八年（352年），慕容儁称帝，建元元玺，定国号为大燕。此时，东晋遣使者诣见慕容儁，慕容儁对东晋使臣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天子矣。”^[7]至此，前燕政权断绝了与东晋的朝贡册封关系。慕容儁称帝之后，立都于邺，但仍以辽西为其发展的基地，慕容儁往来于邺城与龙城之间。在此期间，燕军北破丁零、敕勒，降匈奴单于贺赖头部，南败东晋，占领黄河以南的汝、颖、谯、沛等地，据上党、上郡等地自立的后赵旧将张平也被燕军击溃。前燕政权达到极盛。

随着前燕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原文化的因子在前燕已经开始生根发芽，用以判定政权合法性的“五德终始说”也在前燕社会中引起过争论。在由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大金德运图说》中，鲜卑慕容氏所建前燕政权奉行“木德”。这一记载未能体现前燕由慕容儁朝时所奉“水德”到“木德”的转变过程，掩盖了前燕社会也曾出现过德运之争的史事。

前燕用五德终始学说来诠释自己的德运当始自慕容儁朝。《晋书·慕容儁载记》中记载了前燕群臣所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从被慕容儁采纳的结果来看，前燕的“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则据五行相生原理，“金生水”，前燕代“金德”之后，当为“水德”。而五德又配之五色，尚“黑”者当为“水德”。众多史料也显示，慕容儁称帝之初认为前燕是承晋为“水德”。

前燕所承德运应是“水德”还是“木德”曾有争议，也曾有改“水德”为“木德”之事，只是在前燕德运之争出现的时代问题上存在争议。由《晋书·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记载可知“俊僞位，将定五行次，众

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俊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俊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俊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2]（p. 2843）慕容儁朝讨论前燕德运时，群臣多以前燕承晋正统而为“水德”。在此“水德”之运已经商定后，韩恒从龙城赶来，提出前燕应当承赵正统而为“木德”。提到前燕的符瑞为龙，在龙、凤、麒麟、虎、皮幔胡“五虫”中，龙为“木德”，也与承赵为“木德”相符。在慕容儁统治初期虽很难更改，但从“后终从恒议”来看，改前燕“水德”为“木德”当在慕容儁朝后期。

《晋书·慕容暉载记》中则有“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暉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暉从之”^[8]（p. 2851）。虽然都是在介绍将前燕德运更为“木德”，但《晋书·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所记似为慕容儁后来听从韩恒的建议，将前燕由承晋为“水德”改事赵为“木德”，《晋书·慕容暉载记》与《十六国春秋》卷二八《前燕录六·慕容暉上》则是（建熙七年）秋九月，慕容暉听从镇律郎郭钦的奏议，承石虎的水德为“木德”，即“镇律郎郭钦奏议，以暉承石虎水为木德，从之。”^[9]尽管在前燕更改德运的朝代和过程上有所差别，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前燕灭国前已将德运更改为“木德”。

综上所述，慕容鲜卑人的正统观念在“华夷观”、“正闰观”、“道统观”的阶段性变化中体现出前燕政权“勤王杖义”、“自称燕王”、“已为天子”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原士人出仕前燕的心态也经历了由慕容廆时期受“华夷之辨”影响流寓前燕只为避乱保宗族，到慕容皝时期欣然接受慕容氏政权、甘心情愿建立功勋，再至慕容儁时期认同前燕承正统的转变。其最为直观的表现即为，由四库馆臣在《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金德运图说》的图表中前燕奉行“木德”，中原士人在前燕德运之争中为慕容儁出谋献策，使前燕由慕容儁朝时所奉行的“水德”最终实现了在慕容暉朝改奉“木德”。

【参 考 文 献】

- [1]晋书·慕容廆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晋书·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二·慕容皝上[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
- [5]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三·慕容皝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四·慕容儁上[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五·慕容儁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晋书·慕容暉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六·慕容暉上[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